

跨文化、跨学科的多维阐释

——评《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

朱振武

跨界生存与跨文化传播现象从古代社会就已开始,不过没有形成当今世界这般广度与深度。随着全球化发展进程的深入,文化混合、文学混杂、媒介融合等现象越来越多,形成不可阻挡也不可忽视的文化趋势;而文学界的跨界生存与跨文化创作现象尤其明显,突出地表现在近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身上,如1990年墨西哥诗人帕斯因“成功地将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前的文化、西班牙殖民者的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为一体”^[1]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92年得主圣卢西亚诗人沃尔科特的获奖评语中说他的诗歌“是多元文化驱动下的产物”,颁奖词中说他的诗作具有“几种文化传统的混声合唱或是几个主题的交响协奏”,呈现出“黑白混血风格”;^[1]1993年得主莫里森的大部分作品都描写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冲突,并在冲突中寻找解决的渠道;2001年得主印裔英国作家奈保尔的作品涉及“特立尼达”、“涵盖了印度、非洲、南北美洲、亚洲的伊斯兰国家,以及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英国”,^[2]融合了多种文化;2003年得主南非作家J·M·库切的主要作品表现了欧洲文明与非洲文明的冲突;2006年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获奖的理由是“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杂糅的新象征”,体现出混杂性(hybridity)特点。^[3]还有2012年得主我国作家莫言的创作“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也具有鲜明的跨界特征。他们的获奖表明全球文化界、文学界、学术界对跨文化创作、跨文化传播、跨界生存现象的高度重视。

我国学术界近年特别重视对这些作家的介绍、翻译与研究,很好地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传播,对提高我国文学创作水平、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处理复杂的文化冲突与文化混杂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杨中举的专著《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是其中的重要收获之一。从本书的后记可知“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早在帕慕克获2006年奖后的第三年(2008年)就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科立项,经过三年多的研究,以同名专著顺利结题。这说明了国家层面对跨界生存、跨文化传播、跨界创作现象的重视。通读全书,可以看出著者很好地把握了帕慕克跨界生存状态、思想状况与跨文化、混杂化创作规律,并相应运用跨文化、跨学科的方法对其创作的总体风格、每一部作品进行了多维度的阐释,涉及到“呼愁”文化诗学风格、东西文化冲突、宗教信仰、政治选举、文化身份认同、爱情、文明的兴衰等复杂问题。

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呼愁”文化诗学风格,这一风格贯穿帕慕克小说创作始终。这种“呼愁”与一般的忧愁、忧伤不同,它根源于宗教、浸渍于历史、传承于土耳其作家作品中、也散见于西方作家的书写中、更多地充满在土耳其文化中,也表现在东西文化思想冲突中。《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的著者较好地把握了这种文化呼愁风格,以一种充满文学情怀的调子、富有诗意的语言,把帕慕克个人的、整个民族的、文化与历史的呼愁展现而出:“它弥漫于创作的字里行间,存在于小说人物性格气质、言行举止中,萦绕在作者的思想里,盘旋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城市物质空间与精神文化当中,贯穿在土耳其现代化历史进行中,游荡在东西文化冲突与混合的进程里,在帕慕克看来,‘呼愁’是伊斯坦布尔的城市文化风格,已经成为土耳其民族的个性特征之一。从文学接受与研

究的角度讲,‘呼愁’则是理解帕慕克小说的关键。”^{[4](2)}接着著者运用历史学、医学、心理学、文化学、人文地理学、文学、宗教学相关学科视角,揭示了生成“呼愁”文化诗学风格的内在原因:(1)在帕慕克看来,他个人的和整个土耳其的“呼愁”均源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和奥斯曼帝国衰落史;(2)在土耳其历史文化、宗教、哲学传统语境中,“呼愁”(hüzün)一词是土耳其语的“忧伤”之意,原指失落及伴随而来的心痛与悲伤。它根源于阿拉伯伊斯兰教;(3)医学、心理学与哲学意义上的“呼愁”,涉及生理、心理、精神文化方面,在这个层面上帕慕克探索了这个词的起源;(4)西方旅行者和作家视角下伊斯坦布尔的城市忧伤,这些西方人视角对后来的土耳其诗人、作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5)土耳其四位有代表性的孤独忧伤的作家是:诗人雅哈亚、历史学家科丘、小说家坦皮纳、记事散文家希萨尔。从他们的作品中,帕慕克清楚地认识到“呼愁”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灵魂”。四位作家都是处于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关系中的人,都深受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影响,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把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融合在一起;(6)从根本上说,“呼愁”产生于东西方文化冲突与交融混杂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土耳其、特别是伊斯坦布尔横跨东西方的地理与文化空间,使其天然具有历史文化生成作用;“呼愁”还是一种由知识分子个人的感觉发展到土耳其民族集体的忧伤感觉,它已不是某一孤独者的忧伤,而是千百万人心中共有的忧郁情结。^{[4](3-9)}这种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客观、真实,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也有一定的理论建树,从根本上解决了研究帕慕克小说创作的理论前提。

东西方文化关系是帕慕克创作的中心主题,正是这种东西文化空间为“呼愁”提供了生长的文化基因。《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对此设专章“呼愁缘起: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交互影响”进行讨论,具体论述了直接影响帕慕克的东西文化因素,深化了绪论的研究,进一步为后面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具体从三方面进行了论证:(1)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东西方文化问题、传统与现代问题,形成了混合、交叉状态,构成了独特的历史、宗教、种族、文化生态环境,深刻地影响着土耳其的现实与未来,也深刻影响了帕慕克本人;^{[4](21)}(2)帕慕克作为一个奥斯曼后裔,他深深地浸润于伊斯兰文化语境中,他的种族出身、家庭背景、小时候的生活与学习,成为作家后的阅读、写作与研究都与伊斯兰传统文化、文学密切联系,没有伊斯兰文化传统就没有帕慕克;^{[4](33)}(3)西方文化、文学的影响:“帕慕克是东西方文化共同的‘养子’。他自称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桥梁’,连接了两个大陆,东西方文化在他的灵魂中交汇,形成其独特的双栖性状态。如果说伊斯兰文化、文学是帕慕克这块‘璧’的一面,而西方文化、文学则是‘璧’的另一面,两面相合,才是‘完璧’。抛开哪一面,帕慕克都是不完整的,帕慕克的研究也是残缺的。”^{[4](45)}这些理论梳理逻辑性强,前后一致,为具体作品研究找到了坚实的立足点,也为全书的系统化、理论化提供了支架。

帕慕克每一部新作问世都会引起热销,引发文学界、文化界、宗教界、政界的争鸣甚至冲突。这说明帕慕克的创作触及了时代的痛处、把准了社会的脉搏,并且每一次都有新的发展。《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以9个章节的篇幅分别就9部作品进行了文本解读与理性分析,深入浅出地揭示了这些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为何引发争鸣,有何变化与发展,既充满文学性又富有理论思辨性。研究者以帕慕克小说写作的时间为先后排列相关研究内容,紧扣作品文本,结合帕慕克自身的文学观,深入土耳其历史与文化、伊斯兰世界、东西方文化,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模糊到清晰,对东西文化冲突、现代化困境、历史与文化身份、人生与文化、爱情与城市、时间与空间、政治与宗教、性与情、生活与艺术等多重“呼愁”一一解读、剖析。在此过程中,可以深切体会到著者换位思考,进入了帕慕克的艺术世界与思想领地,情理并举,一气呵成,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帕慕克。

帕慕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杰夫代特先生和他的儿子们》通过三代人的命运,表现了东西文化关系冲突与融合相交错的过程。《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以文本细读法、人物形象分析法,揭示了这

一主题：“小说反映的20世纪百年史，是土耳其社会变革与动荡的历史，充满着东西方思想、文化的冲突，上演着不同政治派别、宗教团体、民族的纷争；从微观上看，这些历史变化渗透到土耳其普通人的思想、行动、个性、行为方式之中。这个过程中，始终呈现出“冲突中有融合、融合中有冲突”的特点，特别是小说故事发生地伊斯坦布尔这座横跨东西方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特殊城市，处于潮头，时代的各种变化、冲突更是弥漫各个角落。杰夫代特先生一家三代为代表的土耳其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与土壤中生活的，他们无可避免地染上浓厚的时代色彩，其中共同的因素就是无孔不入的时代忧郁症——呼愁。”^{[4](71)} 同样，著者在第三章《现代化呼愁：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写真图——〈寂静的房子〉》分析了祖孙三代人面对现代化时的困境；而在讨论历史小说《白色城堡》时，著者重点分析了小说中人物身份互换的文化隐喻，揭示出帕慕克在文化困惑中的理想追求：“帕慕克的小说《白色城堡》通过两个不同文化文明背景人物彼此互换身份的寓言性故事，思考了‘我为什么如我所示’这个带有强烈哲学意味的文化身份问题，批判了一种文化战胜另一种文化的思想，一种文化优越于另一种文化的谬论，表明不同文化相互借鉴与融合、共同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表达了作者‘杂文化（hybridization）是新生活的模式’的理想。”^{[4](97)} 而在对《黑书》、《新人生》研究两章里，著者重点揭示小说主人公对自我身份的寻找、对人生真义的探究过程，试图同作者一同解开文化身份与人生的双重“迷宫”；《我的名字叫红》是帕慕克的代表作，小说以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背景，围绕土耳其苏丹宫廷细密画师高雅被杀事件，分59个叙述单元，讲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作者把现代、后现代艺术和传统经典的叙事方法相结合，营造了一部兼容历史小说、推理小说、侦探小说、文化小说、爱情小说、心理小说、迷宫小说等于一体的百科全书式作品，以众多的人、事、物作为象征性形象，反映了土耳其历史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探索了对权力、名誉、美、爱情等进行争夺、占有过程中人性的裂变，在这些总结的基础上研究者准确总结出了它的中心主题：“文化、艺术、信仰的多重呼愁。”第八章《政治与信仰呼愁：追寻生活的对称美与文化的和谐美》研究了帕慕克的政治小说代表作《雪》，小说用“雪花”图形这个隐喻表达了对称与和谐理想，用政治、生命、诗歌等因素去展现，具有哲学本体追问的深刻用意：“诗意的雪背后，并不是自然之雪向我们昭示的这样简单、美丽而纯洁，雪景的背景上总是投下了浓重的呼愁感，雪的背景中总伴随着政治冲突、信仰冲突、谋杀、怀疑、监视、迫害、自杀、阴谋等等阴暗的东西。”^{[4](181)} 第九章《爱情呼愁：爱情之伤与文化之痛的双重变奏》专门讨论了帕慕克著名的爱情小说《纯真博物馆》，研究者非常精当地指出了帕慕克这部小说不只是写刻骨铭心的爱情主题，更有深刻用意：“帕慕克在世界讴歌爱情的文学艺术画廊中，奉献出了一幅独一无二的爱情画卷，揭示出呼愁遍布的爱情之伤与文化之痛。”^{[4](209)} 第十章《城市呼愁：伊斯坦布尔对帕慕克小说创作的意义》以文学地理学为视角，揭示帕慕克城市空间叙事风格特色，指出伊斯坦布尔是帕慕克创作中的“另类主人公”、“特殊人物形象”：“伊斯坦布尔是帕慕克的艺术生命之源，帕慕克是伊斯坦布尔城的灵魂新绿，给这座城市增添了艺术的常青树；因为帕慕克伊斯坦布尔又一次为世界瞩目、又一次刻进了艺术的画廊，其生命活力将比城市的废墟更加久长，在文学艺术的世界中，伊斯坦布尔才能真正永远不朽。伊斯坦布尔是帕慕克作品中最核心的‘主人公’，她的身影随处可见，带着浓烈的呼愁性格，弥漫了字里行间，也引发了千万读者无限的怅惘。”^{[4](228)}

在系统论述帕慕克小说文化呼愁风格的过程中，论者还在每一章里特别设置专节就每一部小说的艺术风格进行概括、归纳、提炼，据不完全搜索统计，正如文化混合与混杂一样，著者常常以“混杂化”、“杂交性”为核心关键词表达帕慕克小说的艺术风格：“帕慕克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在众多的作家之中——行走，帕慕克和许多现代、后现代作家一样，吃着‘百家饭’、穿着百衲衣，博采众长，成为文学‘行者’，他的创作失去了纯粹，而

获得了混杂性与混合性。”^{[4](56)}

综观国内研究帕慕克的成果,《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具有开拓作用,它是第一本系统研究帕慕克的专著,对外国文学研究、教学及文化研究者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它至少在下列五个方面为奥尔罕·帕慕克研究做出了贡献:一是较好地厘清了“呼愁”概念;二是较完整地论证了帕慕克的文化诗学风格;三是较深入地剖析了东西方文化冲突对帕慕克创作的思想与艺术影响;四是把帕慕克创作中的城市形象“伊斯坦布尔”的价值进行了准确定位;五是跨文化、跨学科的思维研究路径与帕慕克创作的跨界、跨文化特点天然一致,这也是本书突出的特色。

同时,这一成果也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1)为研究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借鉴、冲突与融合等问题提供参考;(2)可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和谐文化建设提供参考;(3)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进一步研究文明冲突与共存的具体现象,寻找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借鉴与沟通的正确渠道,探索世界文化多样性与同一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和谐发展提供理论与文化参考;(4)在全球化背景下开展帕慕克研究,对开放中的中国文化、文学发展也具有启示意义。帕慕克是把西方文学与东方传统成功结合的典范,这为处于探索、发展时期的中国当代作家如何借鉴、融会东西方文学传统,进行文学创作、文化建设提供了个案参照。

当然,文学本身的特性决定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也是一家之言,自有其不足之处,最明显的是理论的提炼还欠缺。相信著者能够在将来的研究中进行相应弥补。

参考文献:

- [1] 毛信德等. 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词全编 [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1: 864, 902-903.
- [2] 瑞典文学院. 二00一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 [J]. 阮学勤译. 世界文学, 2002 (1): 133.
- [3] 杨中举. 营构文化冲突与杂糅的艺术新象征 [J]. 译林, 2007 (1): 59.
- [4] 杨中举. 奥尔罕·帕慕克研究 [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

作者简介:朱振武,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